



高山仰止

邓小平 与现代中国

【上卷】

薛庆超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高山仰止

邓小平

与现代中国

【上卷】

薛庆超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山仰止：邓小平与现代中国/薛庆超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 3
ISBN 978-7-209-10078-6

I. ①高… II. ①薛… III. ①邓小平 (1904-1997) —生平事迹 IV. ①A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 第241809 号

高山仰止

——邓小平与现代中国
薛庆超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16 开 (169mm × 239mm)
印 张 93.75
字 数 15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
印 数 1—3000

ISBN 978-7-209-10078-6

定 价 180.00 元 (上下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薛庆超，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历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秘书、学术处处长、科研管理部主任助理、宣传教育局主持工作副局长等。

兼任纪念抗战胜利“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阅读评论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光明网理论专家委员会成员等，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华北电力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科技大学、青岛农业大学等10余所院校兼职教授。

参与中央重大展览和中央重大活动，担任重要成员或者顾问。在联合国举办的《为了和平的纪念——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暨联合国成立70周年图片展》中国代表团成员，《复兴之路》展览小组成员，《辉煌60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展览小组成员，《科学发展，成就辉煌——迎接党的十八大展览》展览内容组副组长，《伟大胜利，历史贡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展览小组成员，中央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展览筹备委员会办公室成员，中央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文艺晚会历史顾问，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西安事变》历史顾问等。

在中央机关、部队、大学讲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共中央办公厅电子科技学院、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干部学院、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和黄埔军校同学会、文化部、国资委干部培训班、交通运输部干部培训班、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单位，空军后勤部、北京军区、陆军航空兵阅兵指挥部、总政歌舞

代 序

“智者不惑,仁者无忧,勇者不惧”

——邓小平的历史特质与本书回应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

薛庆超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滋润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衍发展。中国古代著名论文《留侯论》中写道:“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近现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经过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多年历史文化的滋养和中国丰厚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润,中华民族的历史巨人层出不穷。他们的历史活动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他们的思想、观点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9年五四运动,揭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成立,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然而,中国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大革命汹涌澎湃,出现陈独秀右倾错误;武装起义风起云涌,发生瞿秋白“左”倾错误;全国红军发展到数十万人,李立三“左”倾盲动;中国革命开始复兴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又在统治中央。中国革命正是在经历了多次胜利与失败、高潮与低潮、成功经验与沉痛教训以后,选择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中国革命前期丰富经验与挫折教训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奋勇前进,引导中国革命赢得了全国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举国欢腾,普天同庆,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分地

区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历史性的辉煌胜利一个接着一个。然而，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本来，有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有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有了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七年的成功经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应当是平坦的。然而，谁也没有料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样是艰难曲折的。“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①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说过：“智者不惑，仁者无忧，勇者不惧。”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风暴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过程中，孕育、锻炼、造就和选择了邓小平这样的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熟悉历史上的丰富经验与沉痛教训，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愿望，明察当代世界的发展变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甚至认为：邓小平是“上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专门赐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改革开放、改天换地的“福星”。

我在从事党史研究、党史人物研究过程中，撰写了一些关于邓小平与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著作。但本书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旨在全方位地描述邓小平与现代中国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历史命运，尤其注重回应一些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焦点问题和有争议的问题。

一是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现邓小平的历史轨迹与突出特点。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造就了大批具有大智大勇的民族精英。邓小平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的一生，艰难曲折，丰富多彩，壮丽辉煌。他政治生涯“三落三起”的低潮与高潮、逆境与顺境，折射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道路的曲折与辉煌。邓小平1979年访问美国时，在美国总统卡特的欢迎国宴上，谈笑风生，妙语连珠。当一位美国人对他的个人经历表示很感兴趣时，邓小平十分幽默地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置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邓小平的“一落一起”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奠定了他终身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左”倾错误倾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邓小平的“二落二起”发生在十年动乱时期，奠定了他结束“文化大革命”、实现安定团结的思想基础。1975年他主持全面整顿，举国拥护，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的政治基础。邓小平的“三落三起”发生在十年动乱结束前后，奠定了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人民要求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开辟改革开放新路。这时，历史发展把邓小平推到时代潮流前列，他义无反顾地担当起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重任。在邓小平等的推动、支持、领导下，全国开展思想解放运动，雷厉风行地平反冤假错案，彻底否定

“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成为中国的历史潮流。从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从邓小平的“三落三起”可以看出，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独立探索，坚持开拓创新。在逆境中锻造了“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钢铁公司”的刚毅性格和坚韧不拔的革命品格。他在“三落三起”中体验过人生的高潮与低潮、潮起与潮落。面对逆境，他总是坦然处之，等待新的机遇与历史召唤。

二是更加科学、准确地展现邓小平的“实事求是”与勇于担当。

“实事求是”，出自古代经典《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指从实际对象出发，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事物的本质。通常指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办事。全国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发动全党整风运动时，将“实事求是”点石成金，赋予崭新的时代内涵。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阐述道，“是”就是事物的规律，“求是”就是认真追求、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工作的向导。毛泽东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要找“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这个“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认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因此，从延安整风运动起，“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贯穿邓小平的整个政治生涯。20世纪30年代前期，邓小平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遭到过“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政治迫害，奠定了他实事求是、勇于担当的突出政治特质。在本书中可以看到，他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被打倒、1976年年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爆发后再次被打倒，都不是因为犯了错误，恰恰是由于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担当。而且，他每次恢复工作，担任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后，绝不消极、绝不退缩，而是义无反顾、坚定前行。凡是认准了的方向，一往无前，

“虽九死其犹未悔”，“九头牛也拉不回来”。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他在《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从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与现代化新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一直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三是更加科学、准确地展现邓小平的从容淡定与宠辱不惊。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智慧、崇高的政治威望和开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新时期的辉煌业绩，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世界人民的高度尊重。邓小平是革命家、战略家、政治家。他的政治生涯，既波澜壮阔，又屡经磨难，他坦率承认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和“乐观主义者”。他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家庭生活上都给邓小平带来诸多磨难。他曾经深有感触地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① 每当受到错误打击、处于逆境时，邓小平从不消沉，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忠贞不渝，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认真读书，深刻思考，聚集力量，迎接机遇的到来。因此，他总是能够顺应历史发展需要和时代要求，在经历逆境之后，重新担当重任，思想上有新创见，理论上有新突破，实践中有新思路，历史上有新创造。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曾就应当如何应对政治风浪中的沉浮，请教邓小平。特鲁多回顾说：记得在1979年，我有几个月下野了，那期间我又访问了中国，去了西藏。从西藏回到北京后，我见到邓小平。我问他，我现在下野了，但希望重返政治舞台，你曾经有过这种经历，你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55页。

的秘诀是什么？邓小平干脆利落地回答：只有一个——忍耐。特鲁多便练习忍耐，果然重返政治舞台。芬兰前首相索尔萨从欧洲人的角度对“忍耐”一词所包含着的深刻哲理和政治内涵进行了诠释：我们芬兰语中有个特别的词汇——忍耐，含意是拥有崇高的信仰，对为之奋斗的事业充满信心。这个忍耐与信仰，便是邓小平的财产。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从江西南昌的流放地返回北京，就托人从香港买到一套金庸小说，闲暇时阅读，借以休息。1981年邓小平接见金庸，两人握手时，他热情地说：“我们已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经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1986年9月2日，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会见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华莱士问：邓主任刚才谈到“文化大革命”，在那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遭遇如何？邓小平回答：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①

四是更加科学、准确地展现邓小平的世界眼光与外交智慧。

邓小平早年到欧洲，在资本主义法国勤工俭学，到社会主义苏联学习政治理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期间，见识了苏联共产党暴风骤雨般的党内斗争。邓小平阅历丰富，目光远大，视野宽阔，是一位世界级国际政治家和国际外交家。他高屋建瓴，全局在胸，沉着冷静，深思熟虑，在处理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等方面，胸有成竹，游刃有余，才华横溢，尽显风采。本书根据翔实的历史资料，讲述了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使人们感受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这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治家、外交家的国际魅力与外交风采。邓小平不仅在国内政治事务中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担当，在国际事务中同样坚持实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事求是、勇于担当。他在访问美国期间，坚持原则，化解矛盾，赢得美国朝野的衷心赞誉。他在访问日本期间，实事求是，提出妥善应对钓鱼岛问题的高明对策，赢得日本政界和舆论界的广泛赞同。他抓住机遇，果断实现中国与苏联关系正常化。他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苏联解体后，指导中国外交抢占先机，带领中国与东欧一系列刚刚成立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彻底粉碎了台湾企图与这些国家“建立关系”的图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严峻形势下，邓小平高瞻远瞩，牢牢掌控应对国内外形势的主动权，在国内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国际上，“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立足于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有所作为”。于是，中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自己。在整个人类进入21世纪后，在美国手忙脚乱地充当“国际宪兵”“国际警察”，声称要“领导世界”、实则是称霸世界的时候，惊回首，中国已经悄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五是更加科学、准确地展现邓小平的高屋建瓴与处理中美关系的辩证思维。

中国与美国隔着浩瀚的太平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鉴于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政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毛泽东时代，中美关系一直由毛泽东直接掌握。毛泽东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拓者、主导者和领导者。周恩来是毛泽东关于中美关系战略决策的实施者。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中美关系一直由邓小平直接掌握并作出战略决策。每当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总是由邓小平作出一言九鼎的重要讲话，引领事物发展变化或出现新的转机。邓小平不仅是新时期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中美建交的推进者、中美关系的引领者、中美矛盾的掌控者。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奠定了中美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同时，邓小平具有高度的正确处理中美关系的辩证思维。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一直坚持原则，并告诫美国：别干预中国内政，中国块头大，不信邪。

与中国直接冲突，是个危险的选择。1981年1月4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西奥多·史蒂文斯和美国共和党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阐明中国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邓小平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可是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1983年3月30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众议院代表团。在谈到中美关系时，邓小平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中国的内政，别人无权干涉。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朋友们，如果我们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这条路走不通，怎么办？最终用武力也必须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到那个时候，美国的选择有两个，一是不干涉，二是参战，中美直接冲突，这是一个危险的选择。1983年4月28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前外务大臣樱内义雄一行，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邓小平严肃指出：美国对外政策中有一个说法，就是美国有几个“航空母舰”，台湾就是一个。里根说台湾是老朋友。什么老朋友？我跟他们说，你们有几个“航空母舰”。所谓“航空母舰”，就是美国的战略基地。所谓老朋友，是空话，掩盖着真实的东西，就是它要霸占那个地方。1983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外宾，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里根竞选时讲了一些话，上台以后，实际上执行的是“两个中国”的政策。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在中东问题、南非问题包括南朝鲜问题上加强了对美国的批评，我们讲四个“航空母舰”也讲得多起来了。美国人说，你们为什么批评我们是霸权主义，不要这样讲，太刺耳了。我说，你这个“航空母舰”是什么东西，什么政策？《与台湾关系法》是什么政策？这不是霸权主义是什么？1981年6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中美关系问题时指出：对美国一定要有最坏情况的打算。不要怕中美关系倒退，更不要怕停滞。对在停滞、倒退的情况下如何同美国交往，要认真准备。中美关系中突出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我们不能含糊其辞。1989年7月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斯科克罗夫特时指出：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需明确

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

六是更加科学、准确地展现邓小平的战略思维与“一国两制”构想。

20世纪80年代，历史发展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面前。如何恰当地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需要考虑香港、澳门、台湾的历史与现状。邓小平经过精心思考，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与台湾问题。这是一个创举。1984年10月22日，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全面阐述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台湾问题：

“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两年前撒切尔夫人来谈，当时她坚持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一九九七年后英国要继续管理香港。我跟她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一九九七年要收回整个香港。至于用什么方式收回，我们决定谈判。我说谈判要两年，太短了不行，但是不迟于两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到时候中国要正式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结果真的是谈了两年。开始她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我说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第二个是一九九七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么样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十五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她同意谈这些问题。两年谈判，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是拖在归属和主权问题上，她没有让。当时我还跟她说，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期间香港

发生意外的事情，发生动乱，中英双方根本谈不拢，中国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所以，解决香港问题，我们的调子就是那时定下来的，以后实际上就是按这个调子走的。

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年多的时间确实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自豪，当然自豪同骄傲是两回事，骄傲不得，说大话也不行，毕竟我们还落后。但是，我们确实很有希望，从香港问题的解决就反映出来了。当然，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国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这一点，台湾的人有一种反映，说我们不重视台湾人民。最近国务院总理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在“台湾当局”后面加了一句“和各界人士”，这是我加的。就是说，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现在更要有计划地安排。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这个我们看准了。两三年来，我们一直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批评他把台湾当作他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也有一部分人赞成台湾和我们统一，但不占主导地位。卡特在位的时候，承诺从台湾撤军，同时又通过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就是干涉中国内政。所以，一个台湾方面的工作，一个美国方面的工作，都要花时间。

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蒋经国提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现实吗？你那个“三民主义”在中国搞了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

年，中国搞成了什么样子？“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是一九四九年。使中国人站起来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最近一个外国人问我，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是同对香港的一样？我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①

根据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1997年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这是中国政府用“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成果，标志着中华民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进展。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首先在香港，接着在澳门，已经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并将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彰显更大的威力。

七是更加科学、准确地展现邓小平的历史智慧与政治智慧。

邓小平在欧洲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和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时期；邓小平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长期担任一个大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邓小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邓小平刻骨铭心，最有发言权。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刚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一位外国客人。出生于1904年8月22日的邓小平，这一天刚过了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4~87页。

81岁生日不久。上午9点40分，邓小平身着浅灰色中山装，健步走进会见大厅。由于邓小平在北戴河经常下海游泳，他显得更加健康，走路平稳，身板笔直，气宇非凡。据当时的外交部翻译张维为回忆：正式会见外国客人前，中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和部长助理周觉开始给邓小平汇报。我是第一次见到部长给邓小平汇报，吴学谦和周觉两人在邓小平面前没有拘束，双方有问有答，非常自然。因为邓小平听力不好，他们有些话得讲两遍。邓小平问吴学谦外长，外国客人是不结盟运动主席吗？吴学谦说，不是，现在还是印度。邓小平说：“对，对，我搞错了。”邓小平对吴学谦外长说：“外交部送来的材料我已经看了。”邓小平当时每天工作两个小时左右，一般都安排在上午，外交部送给邓小平的材料是浓缩了的大字本。邓小平问吴学谦外长：“我上次见他是1981年？”吴学谦说：“对。”邓小平说：“那次见面，他有点牢骚。”1981年那次访问时，性格倔强的外国客人当着邓小平的面表示不能理解中国对毛泽东采取的态度，对“文化大革命”遭到否定也颇有微词。邓小平给他做了详尽的解释，中国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实际上，为了准备这次接待，我（张维为）连着几天去外交部非洲司看文件，外交部翻译室也让我阅读邓小平会见其他一些外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熟悉邓小平的讲话风格和遣词用句的习惯。我特别仔细地阅读了邓小平1981年会见这位外国客人的谈话记录。这是他第五次访华，他的国家独立前来过两次，争取中国对反对白人少数人政权的支持。独立后，第一次访华是1980年访问亚洲其他国家时过境北京。第二次是1981年的正式访问。邓小平问吴学谦外长：“他和总理谈得怎么样？”吴学谦说：“很好，但主要是谈双边关系和非洲形势，还有一些国际问题。”邓小平问：“我们给的援助用的怎么样？”这个问题也展现了邓小平务实的一面，过去中国提供给非洲许多援助，往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少援助给腐败官员贪污了，最终效果欠佳。邓小平显然关心非洲的发展道路问题。邓小平问周觉：“白人离开了多少？”邓小平抓住了关键问题，这就是非洲在民族独立之后如何在国家建设中处理好与白人的关系这个问题。吴学谦和周觉一一作了回答。这次来华访问之前，这位外国客人刚在国内赢得大选，竞选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增加